

中国艺术思想史论丛
(三)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

(第三辑)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编委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编委会
责任编辑：宋祥瑞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300千字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册

ISBN 7-301-00296-3/I-065

定价：3.50元

目 录

革新研究方法, 开创古代文论研究的

- 新局面 马 白 (1)
-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 王运熙 (17)
- 中国古代的咏物诗理论 陈一舟 (27)
- 虚实相生, 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辩证法初探之一
..... 陈德礼 (44)
- 从评价《楚辞》的分歧看汉代文艺思想的演变
..... 张少康 (56)
- 从“雅好慷慨”到“雅好清省”
——论魏晋美学思想的演化 萧华荣 (70)
- 论葛洪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思想 郁 沅 (85)
- 文心与阿毗昙心 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 (101)
- 《文心》下篇篇次组合试解 祖保泉 (107)
- 钟嵘《诗品》谢灵运条疏证 张伯伟 (122)
- 钟嵘评建安诗歌 梅运生 (135)
- 苏轼美术思想三题 郎绍君 (152)
- 宋诗活法论与理学的关系初探 张 鸣 (170)
-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文艺启蒙运动 周续赓 (186)
- 李贽《初潭集》、《藏书》及书答杂述中
的小说观述评 王先霭 (204)
- 张竹坡的长篇小说美学思想 周伟民 (215)
- 钱谦益的“诗有本”说 王英志 (234)
- 略论龚自珍的文学思想 孙 静 (255)

梁启超文艺观刍议	夏晓虹 (268)
近代文体改革理论浅探	李庆甲 (287)
东晋画论与老庄思想	
..... [日本] 冈村繁著 马振方译	(303)
颜之推的文学论	
..... [日本] 兴膳宏著 彭恩华译	(322)
论中国叙事文学的批评理论	
..... [美国] 浦安迪著 陈西中译	(343)
水浒书首资料六种 (外一种)	
——兼论编辑资料集诸问题	
..... [美国] 马幼垣	(366)
编后记	(382)

革新研究方法，开创古代文论 研究的新局面

马 白

建国以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许多十分可喜的成就。这不仅表现在研究队伍的空前壮大，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尤其重要的是表现在多数研究工作者已经在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古代文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这是解放前的研究所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是整部研究史上崭新的一页。

现在的问题是，古代文论研究要不要有一个新的发展，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以适应新时代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要求呢？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三年九月给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的题词不仅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样，也为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发展规定了航程。古代文论研究有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服务。这项任务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从事“四化”建设，进行着深刻的改革。自农村到城镇的改革，冲决了旧观念、旧框框的束缚，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日益显示其美妙的前景。文艺在反映时代的改革中实现了自身的改革，创作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正在进行艰辛的艺术探

索，打破过去的陈规旧习，以新的风格、形式、手法来反映新的时代面貌，来满足广大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要求。这就是目前我国社会及文学艺术的现实。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立足于这一现实，以如此绰约多姿的文艺现象作为自己的概括对象，自然要面对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求得新发展。以服务于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为已任的古代文论研究，怎能不追踪时代的步伐，去适应新的形势呢？

我们的视野还必须扩展到世界潮流的广阔背景上。本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而且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人们改变了思维方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果说以往四百多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是科学分化占统治地位的话，那末，现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趋势是以综合为主导的。科学与技术以及各门学科之间的彼此渗透、紧密联系，使科学形成完整的体系，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从而导致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向。被人们称作横断科学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已经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墙，进入了广泛的学科领域，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创新。在美学领域，这种影响所及，使现代美学一反古典美学的做法，追求着体系化、符号化和模式化，追求着客观性、精确性和规范性。在文艺批评领域，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在原有的道德批评、社会批评之外，又出现了心理批评、形式结构批评及原型批评等方法。这就是西方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总趋势。面对这一世界潮流，对于古代文论研究来说，不能不有所考虑。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尽管在世界范围上是与欧洲文论、印度文论鼎足而立的独立体系，其自身具有封闭性的特征，但是，作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真正科学研究来说，必须放眼世界，使之具有开放性。首先，从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科学的分析来看。中国古代文论有其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于它们必须在训诂考证即理解

原来的确切含意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去揭示其理论上的实际内涵，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只停留在以古解古上，很难说已经对古代文论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其次，从中外文论的交流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在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阐明它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确立它在世界文艺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从而达到与其它国家的文艺理论相互交流的目的。而这一切有赖于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有赖于运用相近或相同的具体科学方法和科学的语言。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难于为别人所了解，就无法进行交流，这样，中国古代文论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势必成为一句空话。再次，古代文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既具有中国特色而又经得起国际比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而尽力。为了这一目的，古代文论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于古代文论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又要放眼世界文论发展的实际，只有在这两者的密切结合中，才能对古代文论作出科学的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尽管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属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部门，有分析地吸收、运用现代西方的一些具体科学的方法，还是必要的，有益的。

由此可见，古代文论研究在新形势下必须有新的突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那末，如何实现这种新的突破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认识的突破，其关键在于观念和方法的革新。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如何看待现实和怎样认识现实的方法总是紧密相连。在旧观念、旧方法的束缚下，人类认识世界虽然也能有所前进，但只是量的增加而并非质的飞跃，只有当观念和方法有所革新时，人们认识世界才能实现新的突破。从人类认识史而言，历史上出现过三大思维方法，这就是：古代素朴辩证的方法，近代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思维方法。它们在当时都是革新的成果，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认识世界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一门学科的突破，其关键也在于观念和方法的革

新。所以，某一创见和发明的取得，严格地说是理论思维的胜利。前辈学者汤用彤先生曾经说过，某一具体学科“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①这一精辟见解是极富启示性的。我们可以从古代文论史上找到许多有力的例证。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十分重视观念和方法的革新，正因为 he 深刻地认识到曹丕、陆机等前人著作存在“密而不周”、“巧而碎乱”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弊病，自觉地运用素朴辩证的方法来进行写作，才大大地突破了前人的成就，实现了中国美学史第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奠定了《文心雕龙》在中国美学史乃至世界美学史上的特殊地位。^②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王国维。王国维是矛盾的统一体，在政治上，他忠君保皇，是我国末代王朝的封建遗老；在学术上，他却力主“中学西学”，“互相推助”^③，“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④，是近代将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加以融汇，实现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革新的先驱者。尽管他继承的是康德、叔本华哲学，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等错误观点对后世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可是，当时相对进步的资产阶级观点却又使他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见解。例如，他一反鄙视戏剧的传统观点，充分肯定元曲的历史地位（《宋元戏曲考》）；认为人物塑造“贵具体而不贵抽象”，接触到典型的理论（《红楼梦评论》）；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论述了“理想”与“写实”之区别（《人间词话》）；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并全面论述了“境界”说，等等。正是这些理论成就，完成了中国古代美学向近代美学的历史性过渡。区别两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标志，就是王国维（当然还包括梁启超等学者）所持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与前代的不同。这充分说明观

①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第二六页。

② 关于上述论述，请参阅拙作《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一辑）及《论〈文心雕龙〉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复旦大学《美学与艺术评论》第三辑）两文。

③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④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念、方法革新的重要性。当前，我们要实现古代文论研究的新突破，也非得从这里入手不可。

谈到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革新，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过去所曾经运用过的一些方法。中国古代文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所做的主要是注释、校勘、序录、提要、评点方面的工作；真正的研究始于辛亥革命之后。黄侃、范文澜、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等前辈，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做了不少拓荒性的工作。他们搜集资料，探索源流，究明义理，发挥精旨，批评短长，为文论史研究这一学科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他们的著作至今仍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成为后人继续攀登的阶梯。但历史地看，上述半个世纪前问世的著作，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局限性。某些观点的欠妥、论述的不周、取舍的失当，姑且不论，单就方法论而言，它们多数所采用的是实证的、说明的、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擅长于对某些字句作字义的说明，某些观点作底蕴的探究，某些学派作渊源的叙述，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上述的方法却难以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总体地、实质地把握古代文论的体系及其各种范畴、概念，难以揭示古代文论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是明显的弊端。历史造成的这种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为解放后的研究者所弥补。解放以来，广大古代文论研究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运用历史的、辩证的、逻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他们往往从社会思潮的整体中去阐明文艺思潮的产生，从不同学派的对比中去概括其异同，从范畴、概念的逻辑发展中去尽可能精确地揭示内在涵意。这样做的结果是，或多或少地接触了古代文论的体系，自觉不自觉地涉及了古代文论的内在规律。这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无比威力。当然，问题是仍然存在的，这主要是：第一，某些同志尚不能掌握实质，熟练地运用历史的、辩证的、逻辑的方法，因此在论述中出现了简单类比、牵强附会、任意贬低或拔

高等倾向；第二，某些同志出于认识的偏颇，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方法与现代具体科学方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面对各种方法裹足不前，不能从多种角度、多种途径去展开研究，致使论述单一，进展不快。上述问题都影响了研究成果的扩展。为了开创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局面，应该提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辩证的、逻辑的方法前提下，探索并运用各种具体科学的新方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是最高层次的方法的话，那末，现代具体科学的方法是下一个层次的方法，它们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前者是居于指导地位的，而后者则可以丰富和发展前者。本着这一精神，兹略述古代文论研究可以运用的各种具体新方法如下。应该说明，其中有的方法已被一些同志成功运用，有的则尚待进一步实践，现一并提出，谨供参考。

一、综合研究法

各种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即整体化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趋势。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渗入，是其突出的表现。即以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多种学科协同作战、相互配合，各发挥其特长与功能，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是为无数事例所确证了的。这种运用多种学科的功能，来解开某一科学奥秘的方法，就是综合研究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古代文论研究之中，就是要从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侧面去对古代文论进行立体的研究，这样才能深入地揭示各种范畴的底蕴、各种观点的联系、各种学派的消长。王元化同志是在古代文论领域最早提倡并实践综合研究法的。他把这种方法归结为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尤其是最后一个结合。在谈到文史哲结合时，他说过：“我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后来分为独立的学科，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可说是一大进步，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往往由于分工过细，使各个有关学科彼此隔绝开来，形成完全孤立的状态，从而和国

外强调各种边缘科学的跨界研究的趋势恰成对照。我认为，这种在科学方法上的保守状态是使我们的文艺理论在各个方面都陷于停滞、难以有所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史关系难以分割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国古代向来以文史并称，至于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却往往被忽视。事实上，任何文艺思潮都有它的哲学基础。美学作为哲学一个分枝，就说明两者关系的密切。但这样简单的事实，我们却认识不足。由于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人，不在哲学基础上从美学角度去分析文艺现象，以致不能触及这些现象的根底，把道理说深透。”^①这番话，既是对古代文论研究存在问题切中要害的分析，又是对于古代文论研究如何具体运用综合研究法的扼要说明。《文心雕龙创作论》就是他自觉地运用综合研究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部学术著作之所以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注目，就在于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从世界美学发展的高度，把文史哲结合，对《文心雕龙》进行了综合的考察，突破了种种因袭陈见，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的创见。尽管一些具体结论未必都审慎可靠，这部著作的整体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为古代文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充分显示了综合研究法的无比威力。我自己也曾尝试运用综合研究法，获得初步成果。《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一文是我写作中的《文心雕龙综合研究》的第二篇，在本文中，我试图从哲学思潮与文艺思潮紧密联系这一事实出发，以方法论为中心，去探索《周易》的哲学观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从而回答《文心雕龙》之所以能超越前人的成就，在中国美学史乃至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特殊地位的内在原因。文中的观点能否成立，大家自可评说，但我的主观愿望正如王元化同志所说，在于力求触及并探求文艺现象的根底，把道理说深说透。不运用综合研究法，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是有困难的。

①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二、系统研究法

现代系统科学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它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郎菲所创立的一门逻辑和数学领域的科学，以后广泛传播，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之一。但是，现代系统科学的产生有一个过程，它经历了古代系统观的萌芽、近代系统观的发展、一般系统论创立这样三个阶段。目前，对“系统”概念及系统方式的解释众说纷纭，仅是“系统”概念的定义就有四十余种之多。^①一般地说，系统论是把对象作为系统来进行考察的学说，它有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动态性等原则。系统论的这种原理和方法，完全可以，也应该引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

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召开的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为《论〈文心雕龙〉的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的论文。^②这是运用系统论来研究古代文论初步的、也许是最早的尝试。通过分析，我发现在刘勰朴素的辩证思维中已经蕴含了系统观的萌芽，他对于文学现象的认识及其研究方法，和现代系统科学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启示我们，一种新的方法能够使我们开阔视野，从习见的材料中去得出新的认识，从而使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开拓。它充分说明，系统研究法同样适用于古代文论的研究。

首先，系统论认为：一切系统都是一个整体，部分只是在整体中发挥作用，因此，不能把部分从整体中抽离出来，而应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这就是整体性原则。系统论的这种方法，和传统的实证分析把整体的诸要素加以分割的做法是根本不同的。把这种方法具体运用于古代文论研究，我认为主要在于，应把古代文艺理论看成是一个整体，分别研究诗论、文论、画论、

① 萨多夫斯基《一般系统论原理》，人民出版社，第一〇〇页。

② 此文已刊载于齐鲁书社《文心雕龙学刊》，第四辑。

曲论时也应从这个整体着眼，揭示其内在的联系，而不应孤立的进行研究。而对于某一个理论家的具体观点的分析、理论成就的评价，也应从把握其理论体系或总面貌入手，而不能就事论事，单就个别篇章做出论断，孤立地对某些字句进行解释。诚然，对于古代文论研究来说，版本的考据和校勘，文字的训诂和注释，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我们不应忽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尤其不能抛弃前辈学者辛勤劳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但是，考据训诂之学毕竟不能代替理论研究。正确的做法应该把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在准确地解释个别字句、段落和篇章的基础上，把握其理论体系或理论观点整体的角度，去把握其个别字句、具体观点的真正内涵。古代文论研究中不止一次出现的字义之争、概念之争，正是孤立的实证分析法的后果，而目前逐渐普遍地引起人们重视的对于理论体系的探讨，都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相暗合。

其次，系统论还认为：某一系统内部的诸要素按一定的联系方式组成，一个系统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的组成要素，还决定于它的结构方式。即使要素相同，结构方式的不同也会使事物之间形成区别。每一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组成要素和独特的结构方式。因此，我们要认识一个系统的性质，不仅要考察它的组成要素，而且还要考察它的结构方式。这称做联系性（或结构性）原则。对于古代文论研究来说，运用这一方法，我认为，是应该进行理论的结构分析。而这方面，目前，可说是有待填补的空白，需要广大古代文论研究者加以努力的。这一个和另一个民族的文艺理论体系的不同，不仅表现在范畴、概念的不同上，而且也表现在结构方式的不同上。中国和西方的文艺理论，整体说来，都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在这一前提下，中国侧重于表现，而西方则侧重于再现。因此，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情——气——神——意——品，成为它的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方式；而西方文论的体系是按照描写——细节——性格——环境——真实这样的逻辑加以联系

的。我们只有在分析范畴、概念的基础上，进而分析理论结构的不同，才能真正认识各民族文艺理论体系的特殊性，发扬其民族特色。对于一个民族的文艺理论需要进行结构分析，对于某一个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同样要进行结构分析。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才能认识它独到的理论成就，从而给予恰如其份的评价，确定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第三，系统论把系统看成是按照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的。一个系统对高一级的系统来说是一个要素，而对低一级的要素说又是一个系统。因此，一个大系统内部可以细分为子系统和亚子系统。系统就是由这样一级一级的层次组成的有机联系。这称做有序性（或有机性）原则。这种原理和方法启示我们，在古代文论研究中要注重理论的层次分析，不论是对理论体系还是基本范畴，都应如此。以基本范畴为例，它的层次分析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范畴与范畴的联系中，去揭示某一基本范畴在整个范畴系列中的从属关系。如在《文心雕龙》中，“道”（即宇宙本体）是大系统，它包括了广义的“文”（即文化），这是子系统；这种广义的“文”又包括了狭义的“文”（即文学），这是亚子系统；这种狭义的“文”又包括了作为形式与内容理解的“文”与“质”两个要素；“情志”、“意象”、“风骨”等是“文”“质”统一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文心雕龙》基本范畴的序列。第二个方面，从某一基本范畴的内部来说，就是要揭示出不同层次的具体内涵。如“气”这个基本范畴，有气质、气势、语气、风力等等不同含意，它们分别从属于不同的层次。古代文论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笔墨官司，往往由混淆不同层次所引起，进行层次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基本范畴、概念的理解精密化、科学化。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整体说来，层次分析仍是古代文论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四，在系统论看来，系统有一个生成和变化的过程，不断处于动态之中。只有从动态中把握，才能真正认识系统。这是动

态原则。这种原理也完全适用于古代文论研究。按照这种观点，古代文论中某一基本范畴、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不仅它的形成有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而且形成之后也要经历不断的演变。因此，在进行考察时，除了要变平面的研究为立体的研究外，还必须变静态的研究为动态的研究。而传统的实证分析方法，由于把事物看成是凝固不变的，或者只触及现象，或者只做简单的类比，无法揭示范畴、概念、命题的具体历史内容。实际上，即使是同一个范畴，在不同历史条件的理论家手中，具体解释和运用都是有所不同的。孔子说的“情”和李贽笔下的“情”；曹丕论述的“气”和刘勰阐明的“气”；顾恺之主张的“神”和杜甫提倡的“神”；王若虚提出的“真”和袁枚要求的“真”；……其间都有差别，各自有着不同的涵意。只有从动态中去考察，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认清其真实的面貌。

三、比较研究法

比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并非是新事物，历史已经相当悠久。在西方，早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同一律和矛盾律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比较思想的萌芽，以后斯宾诺莎“任何规定都同时是否定”的名言，也意味着要从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比较中来确定事物的特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曾经广泛地运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理论研究，使它从属于辩证的方法之中。由此可见，比较研究是一切学术领域普遍存在而又出现较早的一种方法。而把比较研究具体运用于文学领域，成立一种新的学科，则是近代的产物。实际上，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我国古代理论家早已开始运用，钟嵘《诗品》关于作家渊源的探索，就是一种影响研究，无疑具有比较研究的性质，只是并未加以体系化，没有得到理论概括而已。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早在本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但只是近年来这个学科才得到迅猛的发展。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原

因在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法，促进了宏观研究意识的形成，从而突出了从总体上进行比较研究的地位。所以，比较研究法就本身说虽然并不是新方法，但是，当前的提倡与重视又分明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比较研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着眼于整体，把诸种有关事物从纵向和横向上进行相互的衡量和对照，从而去确定某一事物的特性以及它在整体中的位置。在古代文论研究中具体运用这种方法，能收取精用宏之效，既可探幽索微，阐明某一理论的精髓，又可居高临下，把握整个体系的轮廓。

横向研究，又称之为平行研究，它包括中外平行比较和民族内部平行比较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外平行比较。我们研究古代文论，不能把视野仅仅局限于古代文论中，而必须扩展到世界文艺理论发展的高度，和西方文论进行对比。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文论尽管植根于自己民族历史生活的土壤之上，却又受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制约。我们只有从世界文艺理论发展这一总的背景出发，才能真正认清我国古代文论发展的内在规律。目前，一些同志有识于此，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孔子与柏拉图、刘勰与亚里士多德、王骥德的《曲律》与莱辛的《汉堡剧评》、叶燮与鲍姆嘉通等等的比较研究，便是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当前的主要问题，一是要扩展领域，把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东方其它国家文论的比较研究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主要的理论家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二、三流的理论家之间同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二是要注意深入。在理论体系之间比较的基础上，可以深入地进行范畴、命题之间的比较研究；在异同比较的基础上，可以深入展开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研究。

其次，是民族内部的平行研究。我们研究某一理论家，也不能把视野局限于一个人身上，而必须顾及同时期的其他理论家。因为他们处于同一历史背景，面对相同的社会思潮，相互之间不免发生影响。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诗论、画论、书论之间的相